

大清帝王

DAQING DIWANG

【爱新觉罗·旻宁】

道光

远方出版社



大
清
帝
王



道

光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齐铁英

大清帝王

主编：朱学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京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75 字数：30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595-762-2/K·58

定价：27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道光继位	(1)
第二章	整顿吏治	(15)
第三章	开源节流	(41)
第四章	以农为本	(70)
第五章	平定张格尔叛乱	(94)
第六章	查禁鸦片	(112)
第七章	鸦片战争	(151)
第八章	战后维权斗争	(217)
第九章	起义风起云涌	(244)
第十章	感情生活	(262)
第十一章	悲情道光	(279)
附：	道光微服私访记	(295)

道

光

第一章 道光继位



一、父祖恩宠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9月16日）清晨，东方露白，曙光初现；清宫大内撷芳殿中所，经过一番紧张而又兴奋地忙碌，大清皇室的又一个皇子降生人世。他就是后来大清王朝的第八代君王道光皇帝——绵宁。

绵宁的降生，带给皇室的愉悦是可以理解的。此时，绵宁父、祖俱在。其祖乾隆，时年七十二岁，已是年过古稀；其父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时年二十三岁。对乾隆来说，古稀之年，喜得“龙孙”；对颙琰而言，则是长子早丧之后，又添贵子。所以，祖、父两人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绵宁的降生，对乾隆、颙琰乃至大清江山，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乾隆即位之后，一直为至关重要的立储问题所困惑。封建王朝时代，册立皇太子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历代皇帝均为此煞费苦心，乾隆也不例外。

乾隆元年，曾首立天资聪颖、气宇不凡的皇次子永琮为储君，但未及三年，永琮猝然而逝。乾隆九年（1744年），皇后富察氏又为乾隆诞育一子永琮，因永琮“出自正嫡，聪颖殊常”，深得乾隆喜爱，遂属意永琮，欲立为太子。不料，永琮没有这份福气，也是三岁而亡。这两次痛失皇子，对乾隆打击



很大。再加上永琮死后不到一年，一直受乾隆宠爱的富察氏亦病逝，搅得乾隆此后心绪烦乱，性情暴躁易怒，以致引发了宫内一系列悲剧。于是，立储之事，一直拖到二十年后。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已属六十三岁的乾隆，深感精力衰退，才最后将颙琰立为皇太子。因乾隆立储，系遵守雍正比例，秘密进行的，故所立何人，只有乾隆自己知晓，年已十四岁的颙琰也不知道内情。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颙琰的嫡福晋，后来的孝淑睿皇后生有一子，但尚未命名，就于次年身亡。颙琰对其长子的夭折，当然悲痛，而在乾隆看来，则不仅是一个普通“龙孙”的夭折，而且是一个皇太孙的损失。如果联系到乾隆早年两次立储，皇太子两次早夭的经历，如今好不容易立了颙琰为皇太子，而颙琰的长子又是早夭，为身后的江山社稷考虑，乾隆的心头不能不罩上一层阴影。所以，在颙琰长子夭折后两年降生的绵宁，即可为颙琰平复长子丧失后的悲痛，又可为乾隆减少帝统继承上的隐忧。因此，整个清宫的喜庆气氛是可想而知的。

绵宁呱呱坠地后，史书记载：“生有圣德，神智内足，天表挺奇，宸仪协度，顾身隆准，玉理珠衡”。对于一个皇子的溢美之词，人们固然无法判断其真伪虚实，难以窥出绵宁初生时的容貌长相。但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做为一个初生婴儿，绵宁的健康和发育，起码是正常的。加之，绵宁又是颙琰的嫡福晋所生，在其兄长早夭后，形同长子，这一嫡长子的优势也使得绵宁在乾隆后期和整个嘉庆一朝始终处于长期受宠的优越地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绵宁的“聪明天亶”，使得“圣业益精”，由此“两朝恩眷，日加隆焉”。



二、修文修武

清朝，做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为了适应和改变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与文化先进的中原民族的巨大反差，实行有效的统治，格外重视皇子的教育和培养，为历代皇子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课读制度。

按照清朝祖制，皇子读书一事，比历代都严格。根据与道光同时代的史学家赵翼的记述，皇子们到六岁就要入学，上学的地方称上书房。每天五鼓时分，天还未亮，就必须进入书房，开始学习。除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因天气炎热，可于中午散学外，其余均为全日制，至薄暮时，方能散学。为防止皇子逃学和师傅懈怠，管门太监还要对教学时间，按时登记，从备察核。学习课程，上午为儒家经典、政治、史事、诗词文章，下午为满文、蒙文、骑射、技勇。

道

光

绵宁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由钦天监择定的良辰吉日里，由宫内府太监手提白沙灯导引，进入上书房。

上书房的师傅都是皇帝从翰林院里挑选才品兼优者充当。绵宁的老师先后有四位。先是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后是礼部右侍郎汪廷珍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颉。这四人都是乾隆和嘉庆年间进士，满腹经纶，可谓名士宿儒。

绵宁聪明好学，颇有天赋。史书说他能“目下十行”，恐有溢美。在上书房里，绵宁先后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典籍，还阅读了《资治通鉴》、《通鉴揽要》、《纲鉴撮要》、《贞观政要》等著作，同时还对《圣祖圣训》、《庭训格言》、《三帝实录》、《开国方略》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从中培养帝王之基，吸取统治之道。此外，诗词文章，也日见精进。从收集绵宁登基以前所写诗文的《养正书屋诗文全集》看，全集共四十卷，其中



诗词部份二十八卷，收作品共二千七百五十五首；文章十二卷，收文一百七十一篇。绵宁诗作，大都是有关政事典仪、较晴量雨、望捷勤民、治河转薄一类的记事之作，而留连景物者，不到十分之一。绵宁的诗文，就整体格调和韵律而言，虽谈不上有什么传世佳作，但大都朴实无华、自然流畅。

绵宁之父嘉庆皇帝一再强调：八旗满洲，以骑射为本，要以弧矢威天下。所以，绵宁在习文的同时，还要进行刻苦的武功训练。

其武功如何，从三件事中可了解大概。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皇帝率领众皇子、皇孙和他一起前往木兰围场行围射猎。这天，大队人马驻在张三营行宫。乾隆心血来潮，想看看皇子、皇孙们的艺业武功，就来到了较射场地，端坐台上，令诸皇子、皇孙依次较射，比个高低。这年，绵宁才年仅八岁。轮到绵宁较射时，绵宁从容不迫，拉开小弓，搭上小箭，一箭射出，正中靶心。紧接着第二箭，再发再中。乾隆喜动天颜，大为高兴，当场谕令：绵宁如能再中一箭，即赏穿黄马褂。绵宁遵照老皇祖谕令，不慌不忙，拉开架势，又搭上一箭，一箭射去，又中箭靶。然后，绵宁收起弓箭，跪倒在乾隆面前，等候听赏。乾隆心中大喜过望，却故意装做不解地问道：“你想要什么？”绵宁不答，仍长跪不起。乾隆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命随行人员速取黄马褂，赏赐绵宁。但因事出仓促，一时找不到小马褂，乾隆不得不将一件大马褂取过，将八岁的绵宁裹住，一抱而起，亲昵异常。

按说，一个八岁儿童，较射弓箭，连中三元，已是不易之事，特别是三发三中后，长跪不起，请赏黄马褂，逼迫其皇祖兑现这份当时人们很难得到的殊荣，足见其年纪不大，却心计不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中秋刚过，天清气爽，风

大清帝王

和日丽，年已八旬的乾隆皇帝，率领着文武百官和宗室王公，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前往木兰（承德府以北四百里处）举行秋狝大典。所谓秋狝，是清朝皇帝和宗室王公在秋季举行的大规模的行围狩猎和军事训练活动。这时的绵宁年方十岁，满身稚气，也被老皇祖带同前往。一日，在威逊格尔围场，高宗乾隆与众王公纵马驰骋，尽情射猎。十岁的绵宁在旁观看一时性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巧，从前方不远的地方窜出一只受惊的小鹿。绵宁见状，急忙弯弓搭箭，射中小鹿。乾隆一见此情此景心中大喜。虽说前年绵宁连中三元的事，乾隆仍记忆犹新，但不能与此次同日同语。前年射的是定点死靶，这次射的却是奔跑中的活鹿，难度大不一样。乾隆欣喜之下，立命随从人员取来花翎、黄马褂，赏给绵宁。事后，乾隆仍不能忘怀此事，并手书御制七律一首：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这首诗说的是乾隆十二岁的时候，曾经随同祖父康熙前往木兰围场行围，康熙搭弓放箭，将一只黑熊射中倒地。康熙为锻炼小皇孙的胆量，即命乾隆前往再射。乾隆来到近前，不料黑熊并未射死，仅是受伤倒地，见有人近前，突然立起，扑向乾隆。乾隆面对危险，毫不惊慌，镇定自若，虚与周旋。康熙在一旁见事不妙，急忙又发一枪，将黑熊击毙。乾隆十二岁随祖父行围，只是遇受伤的熊而不惊，但绵宁随祖父行围，却引弓获鹿，论本领，绵宁当在老皇祖乾隆之上，更何况“所喜争先早二龄”，即绵宁在此乾隆小二岁的时候，就有如此令人瞩目的表现，怎能不令乾隆于欣喜之余，赋诗记盛呢！

乾隆皇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他创造了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势，号称十全武功。他的好恶，他的倾向，对颉颃立储，

道

光



对绵宁的政治生涯应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道光二年（1822年）正月，道光与署陕甘总督朱熹就士兵训练和军队素质问题，有过一段比较详细的奏批。

朱熹奏道：向来绿营兵丁，步箭三四力弓居多；马弓则不过两力。临阵不能杀贼，即技艺娴习，亦属无益。

道光批示：“现在，除东三省外，皆染此习，可恶之至。”

朱熹奏道：“臣所属的骑兵和步兵训练，均以六力弓为标准。”

道光批示：“人之气力，强弱不一，以六力为准，原属旧制。如果马上、步下均能达到四、五力弓。且能有准，就可制胜。”

朱熹奏道：“绿营鸟枪兵，虽施放娴熟，但临阵时，往往枪口过高，实在是因为射击时前、后手不稳造成的。”

道光批示：“此乃绿营通病，不是手不稳，而是技艺生疏的缘故。”

朱熹奏道：“请皇上批准另外制造每支十五斤重的枪，发给士兵操练。”

道光批示：“鸟枪并不是炮，不必弃轻从重。我从小就开始练习鸟枪，深知此法。每支五斤至七、八斤重都可以，关键在于士兵的技艺如何。如果都以每支十五斤重为标准，反而显得笨重，并不适用。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并不是靠臂力的大小决定的。你所说的道理，近于迂腐。”

上述君臣奏、批，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从中不难看出，绵宁对军器的性能、使用和操练还是颇有见地的。

通过严格地培养和训练，绵宁已被塑造成为文武兼备的准帝王形象了。



三、处变不乱

嘉庆登基之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农民起义连绵不绝，此伏彼起。特别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畿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掠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

这年八月，嘉庆皇帝依照祖制，前往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长期从事秘密反清活动的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林清决定，乘嘉庆离京之际，于九月十五日，在河南、直隶两省同时举事。先由林清率领少数义军潜入京城，事发后，抢先攻占紫禁皇城，随后，由李文成率大队义军北上应援。

嘉庆前往木兰秋狝，本来绵宁随行。九月初，木兰一带秋雨连绵，嘉庆被迫减围，并命绵宁先期回京。所以，林清义军进攻紫禁城时，绵宁已在京城，正逢其变。

九月十五日，义军二百人，手持白旗，腰缠白布，兵分两路，向紫禁城逼进。一路由祝现、屈五率领，直奔东华门；一路由李五、宋进才率领，扑向西华门。东华门一路虽有太监刘金、刘得才（该两人均为天理教徒）接应，但因事机不密，被护军发觉，所以，只有十余人进入东华门，其余逃散。西华门一路在太监杨进忠（天理教徒）的导引下，八十余人顺利进入西华门。义军全部入宫后，将看守杀死，关闭了西华门，一路入内，闯进尚衣监、文颖馆，会集于隆宗门外（大门已关）。直到这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绵宁才接到义军闯宫的报告。绵宁急命内监速取鸟枪、撒袋、腰刀，匆匆出门临敌。只见义军战士手执白旗，正由门外廊房攀上高墙，企图进入养心门内。



绵宁见状，在养心殿阶下，忙举枪射击，连续击毙两名义军战士。另有一种说法，说宫内太监与天理教义军相通，递给绵宁的枪弹并不是实弹，绵宁举枪射击，没有命中，发现鸟枪中装的是空弹，慌急之中，取下衣服上的铜扣，充作子弹击出，才将义军战士击毙。其余义军只好退下，不再翻墙。这时，闻讯赶来的清军禁旅陆续云集，大内才得以暂时安定。绵宁又果断地采取如下几项紧急措施：一、急草奏章，飞报远在围场的嘉庆皇帝，奏报事变情形。二、严命关闭禁城四门，令各路官军入宫“捕贼”。三、至储秀宫安抚皇母，嘱皇三子绵恺小心守护。四、亲自率领兵丁前往西长街、西厂一带访查。五、派谕达侍卫在储秀宫、东长街布置，以防不测。由于绵宁的精心部署，举措有力，经过二天一夜，义军这次攻打皇宫的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绵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不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绵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绵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绵宁的地位已与其它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四、立为储君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已经禅位给嘉庆皇帝的太上皇帝乾隆去世。又过了三个月，经过长期的培养和观察，嘉庆皇帝决定将未来的大清江山托付绵宁。四月初十日，嘉庆遵照秘密建储的家法，手书一道硃谕，将绵宁立为储君，并将硃谕封入罐匣，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从此，绵宁成了嘉庆的秘密接班人了。

这时的绵宁已是十八岁的一个勇武青年。嘉庆将其秘密立

大清帝王

为储君之后，培养和教育更加精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督促学业。为激励绵宁勤学苦读，嘉庆为绵宁园中读书之处亲题“养正书屋”扁额，并在闲暇之时，至养正书屋讲课。春天一到，则命绵宁前往南苑行围射猎，夏季炎热，又命绵宁到凉爽怡人的瀛台攻读诗书，以使绵宁早日具备帝王之学。第二，历代封建帝王大都为立储继统而煞费苦心，宫廷内部，为争当太子，争夺皇位，往往勾心斗角，内乱不已，清代也不例外。嘉庆为防微杜渐，避免内争，采取了“防止窥测，杜绝猜疑”等诸多办法，使绵宁的皇太子地位顺理成章的得到稳定。嘉庆十三年（1808年），绵宁的嫡福晋（后封为孝穆成皇后）死去，嘉庆特命使用金黄色座罩，以与其它皇子福晋相区别，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无疑为绵宁的地位罩上了金色的光环。嘉庆十八年（1813年），绵宁与其弟共同镇压了林清发动的禁门之变。绵宁受封智亲王，每年加俸一万二千两；三弟绵恺则仅被传谕褒奖；贝勒绵志也仅晋升郡王衔，每年加俸一千两。这样，绵宁的地位得到了明显地提高。第三，让绵宁直接参与重大的国务活动。清代的不少国务活动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其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绵宁被立为储君后，嘉庆前往寿皇殿展拜列祖列宗，命绵宁随行；前往高宗乾隆的裕陵举行敷土大礼，本该嘉庆亲临，也让绵宁“恭代”；郊、坛的祈年、祈雨等祁报活动，亦多由绵宁代之；有关陵、庙的祭祀活动，也由绵宁代行。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嘉庆皇帝已届晚年，最后一次出巡盛京，参拜清祖三陵（即清先祖的永陵、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又命绵宁随行，在列祖列宗面前，意味深长的对绵宁进行传统教育，令其牢记大清江山缔造艰难，守成不易的道理。

在嘉庆的循循善诱和精心塑造之下，绵宁日渐成熟，只待历史为其提供君临天下的机会了。

道

光



五、荣登大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皇帝又一次前往热河，举行秋狝大典。随行人员除文武群臣外，尚有皇次子绵宁和皇四子绵忻。

七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因偶感中暑，圣躬不愈。二十五日晚，病情突然加重。于是，宣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那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等八大臣，来至榻前，公启鐐匣，宣示嘉庆御书，御书上用硃笔写道：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绵宁。当日晚八时许，嘉庆皇帝驾崩。

清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如果皇帝去世，则由皇后长子继位，如皇后无子，则从妃嫔中先择年长者继位，并且要在皇帝生前，颁发明令，预先立为太子，充任法定继承人。清代一改旧制，即不搞嫡长子继承，也不预立，而是实行“立储以贤”的政策。如太祖努尔哈赤有子十六人，传位给第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有子十一人，传位给第九子福临（顺治），福临去世传位第三子玄烨（康熙）等。除康熙搞过预立太子，不久又废掉之外，其余各朝均不预立太子。

雍正皇帝即位后，清代的皇位继承法发生了变化。在继续坚持立储以贤的原则下，改不预立太子，为预立太子，即秘密建储法。所谓秘密建储法，即是由在位皇帝经过长期考察，从诸皇子中择定一人，以硃笔御书其名，封于锦匣之内，悬置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在位皇帝临终之时，召集御前重臣共同拆启，当众宣布，于是被书名的皇子随即践祚称帝，与嫡长子继承制比较起来，立储以贤，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为防止诸众皇子勾心斗角，保证皇室政权的平稳交接，秘密建

大清帝王

储法，确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措施。

绵宁，是继乾隆、嘉庆之后，按照秘密建储法产生的第三代清代帝王。嘉庆皇帝共有五子九女。在封建皇权的权力角逐中，皇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五位皇子中，长子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79年），次年即死去。次子即是绵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1年），嘉庆四年（1799年）被秘密立为皇太子。三子绵恺，曾与绵宁一起参与平定禁门之变，但只获得传旨嘉奖，直到嘉庆临终前不久，才被封惇郡王，可见其在嘉庆诸子中份量不重。四子绵忻，本来无所建树，却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受封为瑞庆王，比三子绵恺官高一级，与绵宁平级，可能颇受嘉庆皇帝宠爱。至于五子绵愉，嘉庆临终时，年龄尚小，还在上书房读书。据此，可以看出，除皇四子绵忻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绵宁没有竞争对手，顺利即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按史书记载，绵宁即位，确实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仔细推敲，也还有一些令人迷惑不解之处：

第一，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十八日，嘉庆皇帝前往木兰举行秋狝大典。七月二十四日到达避暑山庄，也就在这一天，嘉庆皇帝感到身体不适。二十五日白天，嘉庆帝批阅奏章，接见群臣，还“治事如常”。晚八时左右，嘉庆皇帝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中死去。从发病到崩逝，不满二日，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令人难以相信。对此，嘉庆自己也不能解释，他在临终遗诏中说：“我的身体素来强壮，还未曾得过病。虽然年过六十，行路登山，仍不觉得劳累。这次秋狩途中，只是偶感中暑，昨天还骑马翻越过广仁岭。”绵宁在嘉庆崩逝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初二日的一道谕旨中也证实：嘉庆“虽年过六十，身体康健，精神强固。这次秋狝，我一直跟随左右，父祖行走健步如常。途中虽偶感中暑，登山仍不觉疲倦。”那么，

道

光



身体健康的嘉庆为什么只经一天多就由发病而崩逝呢？可能绵宁也觉得原来说的二十四日“圣躬不愈”，二十五日“宾天”，过于急促了些，于是又改口说，嘉庆是“遭疾三日，遂至大渐”，即病了三天，才病情加重的。到底是一日多，还是三日，不得而知。

第二，按照正史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傍晚，嘉庆病情转重，召集御前八大臣，公启鐐匣，宣示嘉庆御书，立绵宁为皇太子的。问题是，雍正亲定的秘密建储法规定，皇帝立储的御书，封入鐐匣后，照例应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嘉庆皇帝立绵宁为储君的御书自然也不能例外。那么，在避暑山庄公启的鐐匣是哪一个呢？当然不会是“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那一个。如果是另外还有一个鐐匣（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身体素来强壮，未曾得过疾病的嘉庆皇帝是否有必要将这一绝密文件随身携带呢？即使嘉庆皇帝的立储御书确实封存在两个鐐匣里，分别存储，按照清制，“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那个鐐匣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圣旨。然而，所有正史均只记载了避暑山庄公启的鐐匣，而只字未提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鐐匣，不知道绵宁及其群臣在悲喜交替中忘记了“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鐐匣呢，还是有了避暑山庄的御书，无须再验证“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御书呢，或者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干脆就没有什么鐐匣呢！难怪台湾学者陶希圣、沈廷远指出：“据传，嘉庆帝在位时曾密立太子，但未放置正大光明匾上。嘉庆死时，既无明令，也无储君。诸大臣多方搜寻，始找到密存的文件。”

第三，嘉庆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七日，绵宁尊嘉庆皇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绵宁生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死于嘉庆二年），并派御前侍卫吉伦泰带领二名太监，急驰回京，向皇太后禀报嘉庆之死。事隔一天，即八月二十九日，绵宁接到



皇太后传来的懿旨：“嘉庆皇帝归天，自应由智亲王绵宁即位，但恐怕仓卒之中，嘉庆皇帝未曾明白晓谕，而绵宁又一向谦虚，特降懿旨，命留京诸王大臣，请绵宁即位。”从这道懿旨看，皇太后显然不知道发生在避暑山庄的八大臣已公启鐙匣之事，事实也确是如此，所以绵宁在接到皇太后的懿旨后，马上“复奏”二十五日嘉庆临终前八大臣公启鐙匣的过程，并将匣内所藏嘉庆立绵宁为皇太子的殊谕，恭呈给皇太后。既然皇太后当时并不知道嘉庆所立何人，她又无权擅自取下“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鐙匣，为什么将降懿旨，让绵宁不要谦让，当即即位呢？

第四，《清史逸闻》等书记载：绵宁自小聪明神武，十岁即引弓获鹿，深得乾隆宠爱，嘉庆十八年，又以大智大勇平定林清起义有功，“积此二原因，遂臧各金匱（鐙匣）”。那么，绵宁被立为储究竟是嘉庆四年，还是嘉庆十八年以后呢？

第五，绵宁继位不到十天，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人事变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临终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其中有“高宗乾隆降生在避暑山庄”一句话。这份遗诏拟出后，曾经绵宁看过，绵宁也承认当时“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事隔一个多月的九月六日，绵宁又重新审阅遗诏副本，这回发现了问题，绵宁认为高宗乾隆的降生地是雍合宫，不是避暑山庄，且有高宗实录等为证。于是，传旨诘问军机大臣。军机大臣解释说：“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是根据嘉庆御制诗的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诗注得来的。”按说，判断乾隆降生地，乾隆之子嘉庆的诗注，也算得上是权威资料了。遗诏既使有错，也主要是错在嘉庆，其次则是错在绵宁本人，因为绵宁也审阅过遗诏的初稿。但绵宁仍然不依不饶。九月初七日，绵宁降旨，命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留任，四人一并交刑部严议。九

道

光